

汉译经典

CHARLES BAUDELAIRE: EIN LYRIKER IM  
ZEITALTER DES HOCHKAPITALISMUS

# 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德国〕瓦尔特·本雅明 著 王涌 译



译林出版社

汉译经典

〔德国〕瓦尔特·本雅明 著  
王涌 译

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 (德) 本雅明著，  
王涌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0

(汉译经典)

ISBN 978-7-5447-4978-7

I. ①波… II. ①本… ②王… III. ①波德莱尔, C. (1821~1867)  
—抒情诗—诗歌研究 IV. ①I565.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05771号

书 名 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作 者 [德国] 瓦尔特·本雅明

译 者 王 涌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何 婷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151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978-7

定 价 45.6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译者序

1974年，为本雅明身后的闻名立下汗马功劳的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又推出了他的一本名为《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著作。可是，本雅明生前并没有写出过如此命名的著作，那是他晚年庞大写作计划《巴黎拱廊街研究》先期推出的几篇独立文章的汇集。

众所周知，不仅本雅明本人，而且读书界都热切期盼的《巴黎拱廊街研究》由于作者英年早逝，成了一项未完成的遗憾工程。1940年本雅明离世时，有关这项工程留下了大量残稿和散篇。直到1983年，罗尔夫·蒂德曼才应苏尔坎普出版社约请，将这些遗稿按1928—1929和1934—1940两个时间段编辑成二卷本的书稿出版。但是，本雅明在实施这项生前最大写作工程中，又留下了两篇独立的完稿，那就成了本书的主要构成。

整个《巴黎拱廊街研究》是本雅明1927年开始计划实施的，意在集中展示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文递变。“拱廊街”是19世纪初出现在巴黎市中心的步行街，在本雅明眼里，那里不仅是现代都市人的集结地，也是窥视现代人行为的一个窗口。经过整整十年的研究，本雅明从1937年开始感觉到，用一部著作去揭示整个19世纪的历史哲学关联有点问题。于是，就准备将原本属于其中的有关波德莱尔的部分独立出来，单独写一本书，因为其中有关波德莱尔的部分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整个“拱廊街研究”的样态。（参见W.Benjamin, *Briefe*, hrsg. v. Gershom Scholem und Theodor W.Adorno, Frankfurt/M. Suhrkamp 1978, Bd.II, S.750）他在1938年

4月16日给霍克海默尔的一封信中提及这个想法时，还具体设想  
了书名：《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并指出该  
书应由三部分组成：1. 观念与图像；2. 古代与现代；3. 新颖与永  
恒。（参见 W.Benjamin, *Gesammelte Briefe*, hrsg. v. C.Goedde und  
H.Lonitz, Frankfurt/M. Suhrkamp 1995, Bd.VI, S.65—66）可是，在  
他就这些题目真正动手写什么之前，就已不期离世。

不过，霍克海默尔当时获知本雅明的这个想法后，便迫不及待  
地马上约请他先给《社会研究杂志》写一些这方面的文章。于是，  
1938年夏天和冬天，本雅明特此写成了《波德莱尔笔下第二  
帝国的巴黎》一稿。可是，阿多诺在读了文稿之后于1938年11  
月10日写信给本雅明，尖锐指出了该文在理论层面上阐述不够。  
（参见 W.Benjamin, *Briefe*, hrsg. v. Gershom Scholem und Theodor  
W.Adorno, Frankfurt/M. Suhrkamp 1978, Bd.II, S.782—790）本雅明  
花了几个月时间用以消化这些意见。于是，在1939年2月底决  
定再写一篇有关波德莱尔的文章给《社会研究杂志》，那就是同  
年7月完稿的《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一文。很快，这篇文章  
就被发表在了1940年初《社会研究杂志》在欧洲出的最后一期上。  
同年9月，本雅明在法西边境被迫自杀。由此，他想就波德莱尔  
写一本书的想法虽然未得着手，但却留下了这两篇特稿。于是，  
就有了本书。

本书收入的另一篇文稿《巴黎，19世纪的都城》系本雅明  
1935年5月写成。那虽然还是一个散篇，但基本观点和框架已成  
型，而且与那两篇特稿有一定的呼应。因此，这些文章就成了本  
雅明《巴黎拱廊街研究》背景下留下的三篇相对完整的文稿。

读一下这些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到，本雅明谈波德莱尔，谈他  
的诗篇，主要视点并不是对他的诗篇进行美学分析，而是从他的  
诗作中读出了对时代的感受，读出了时代的征象，那是发达资本

主义时期的巴黎，19世纪的巴黎，一个现代派崛起的时代。阐述中又将视点明显聚焦在现代都市体验上。

现代人也罢，现代社会也罢，其实都离不开都市生活，波德莱尔生活的世界恰是这样一个走向现代的都市。巴黎拱廊街里的人群是他都市体验的核心，也是本雅明现代性经验的焦点所在。那是前现代（农业时代）社会没有的：许多人，彼此并不相识的人，密集地共处一个空间，却并不打招呼，不攀谈，每个人只顾着自己如何顺利地前行。人在空间上是如此的近，但没有交流，彼此不了解，心理上又是如此的远。都市生活的意象：冷漠。这是本雅明在波德莱尔诗篇中首先读出的生活感受，人群中的人丝毫不关心他人，只顾自己前行，即便有碰撞，也首要考虑不让前行受影响。唯我、效率成了最重要的。“不关心他人”又使得人群中的人具有了农业时代没有的匿名性，每个人都能将自己藏身于人群中，这样的人群又成了坏心、恶行的温床。人群集聚的都市令人不安，那里不仅有冷漠，也使品行不端者能够藏身。由此，波德莱尔的都市体验和本雅明的现代性经验中又出现了一个意象：波希米亚人的游荡，也就是说，密谋，做坏事。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的诗篇中读出了对都市生活的厌恶、抵触，从而演示了对现代生活的鞭挞，那是冷漠、滋养恶行的人流。

但是，本雅明并没有偏激地一味固执于这样的鞭挞，他在波德莱尔的诗篇，在他的都市体验中又读出了都市人群对他的吸引，那是有关闲逛者的意象。现代都市造就了闲逛者，这些人迷恋大街上的人流，但并没有，也不愿融入其中。他们迷恋置身人群所带来的享受，一种本雅明称之为惊颤体验（Chockerfahrung）的感受。置身街上的人群，不断会面对一些不期而遇的情景，但是，簇拥的人流、不断变换的情景又让你无暇细嚼它们，于是出现惊颤，在一个惊颤还没有平息之时，下一个又接踵出现。久而久之，

人身上就生发出一种快速反应机制，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景象尽可能地快速做出反应，以致人离开这样的人群，离开这样的都市反而会出现不适。于是，出现了闲逛者，特意置身人流，只为身上的快速反应机制能得到满足，只为身历现代都市特有的惊颤体验。这是现代都市给人带来的深刻变化：不求甚解，快速反应。也就是说，对象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对。

这样一来，波希米亚人意象中现代都市令人厌弃的一面就成了无从克服的；虽然他冷漠，遮蔽着各种恶行，但是，由他滋养出的新需求又使人依赖于他，离不开他。表面看，本雅明不仅在波德莱尔的诗篇中读出了这种对现代性的暧昧：既恨又爱，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着这样的暧昧：一方面，披露着现代性中令人生厌的地方；另一方面，也颂扬着现代性对生活内容的拓展和丰富。其实，爱也罢，颂扬也罢，那是因为他们都实事求是地看到了现代性让人着迷的地方，让人难以抵御的地方。即便承认，内心深处也充满着坚韧的不愿。波德莱尔即便迷恋都市，也不愿与之合流，他总是置身人群之外。本雅明则作为理论家，作为学者不遗余力地揭示着这些变化所带有的令人哀伤的一面。

他有关灵韵（*Aura*）的思想，表面看，是在刻画现代艺术领域中发生的变化，其实，是在哀怨现代人自主能力的丧失，哀怨现代人只会认知、跟随，没有了感知和自主精神。他对意愿记忆和非意愿记忆（*mémoire involontaire*）的区分同样是为了宣明现代社会令人哀伤的一面，因为非意愿记忆是现代社会中失落的，而恰恰这样的记忆才是人作为一个个体特有的、无以取代的。

当然，这种鞭挞只是一种精神谴责。虽然生活中现代主义有其难以抵御的诱惑，但是，无论波德莱尔的诗篇，还是本雅明的言词，都在述说着即便无望也要抵御的话语。正是基于此，本雅明将自杀看成是现代社会的英雄行为，那是坚韧的心灵在做的最

后宣示。正是这种坚韧在拯救，拯救着现代人迷失的灵魂。

本雅明这几篇文字的意义或许主要在此。

本译据苏尔坎普出版社 1989 年版《本雅明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 中的三篇同名文章译出。

译者识于 2011 年夏



# 目 录

## 译者序 / 1

## 一 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 / 1

1 波希米亚人 / 3

2 闲逛者 / 30

3 现代主义 / 66

## 二 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 / 105

## 三 巴黎，19 世纪的都城 / 163

1 傅立叶与拱廊街 / 165

2 达盖尔与西洋景 / 169

3 格朗德维埃与世界博览会 / 172

4 路易·菲利浦与居室文化 / 175

5 波德莱尔与巴黎街道 / 178

6 豪斯曼与街垒 / 181

## 一 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

一座人并非绝对需要的都城。

——塞南库<sup>①</sup>

---

<sup>①</sup> 塞南库 (Etienne Pivert de Senancour, 1770—1846), 法国早期浪漫派作家。——译注



# 1 波希米亚人

“波希米亚人”是在马克思一段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文字里出现的，他将这些人称为职业密谋家。1850年，《新莱茵报》上曾详细刊登了警方探子德·拉·琥德的回忆录，马克思凭借这些回忆材料论述了职业密谋家的一些特点。要描述出波德莱尔的特征，就是要去言说他与这类人物的相似之处。马克思是这样去勾勒这类人物的：“随着无产阶级密谋活动的出现便产生了分工的必要，即密谋人被分为两类：一类是临时的，也就是法语中所说的‘临时密谋家’（conspireurs d'occasion），他们只是在不放弃其他工作的情况下参与密谋活动中，他们只是参加会晤，并时刻准备听候领导人的命令前往某集合地点；另一类是职业密谋家，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密谋活动上，并以此为生。……这一类人的生活状况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们的整个性格。……他们飘忽不定，在具体行事上不太关注自己的所为而更看重偶发事件，他们的生活无序可循，唯一具有定性的就是葡萄酒商的那些小酒馆——他们经常歇脚的见面场所，他们结识的人必然是各种不三不四的人，这就使他们被列入了巴黎人所说的那种波希米亚人（La Boheme）之列。”\*<sup>①</sup>

这里顺便应提到的是，拿破仑三世本人也是从这样的氛围中

---

\* 普鲁东（Proudhon）想要把自己同职业密谋家分开，他偶尔自诩为一种“新人，这种新人所干的事不是街垒战，而是论战。他能天天晚上与警察局局长共坐一桌，并能赢得德·拉·琥德所有同仁的信赖”。（转引自古斯塔夫·热弗鲁瓦：《囚徒》，巴黎1897年版，第180—181页）——原注

① 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评谢努“密谋家”》，巴黎1850年版，以及德·拉·琥德：《一八四八年二月共和国的诞生》，巴黎1850年版，转引自《新时代报》第4期（1886年），第555页。——原注

发迹的。众所周知，他执政时期的政治工具之一便是“十二月十日协会”。在马克思眼里，该协会的骨干是由“法国人称之为波希米亚人的人群选出的，这是那些来回跑动但不会散去的不定的人群”。<sup>①</sup>拿破仑三世在位期间继续保持了她的密谋习惯。突如其来的公告，秘密的流言，捉摸不定的出击和难以理会的反语都是第二帝国国家利益至上理性的组成部分。在波德莱尔的理论文章中也可以发现同样的特点。他表述自己的观点时往往不容争辩，讨论不是他要做的事，即使论题有明显的矛盾以致讨论显得必不可少时，他也会回避。他把自己的文章《一八四六年沙龙》题献给了“有资产者”，并以这些人的辩护士形象出现，但他的样子却不像一个为魔鬼辩护的人，比如，他不久后大骂良知学派时，便以最激烈的波希米亚人方式攻击了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以及为他们所尊敬的公证人。<sup>②</sup>1850年前后，他宣称艺术不能同功利分开，几年后又鼓吹为艺术而艺术。在他的读者面前，他很少想到如何传达的问题，这一点与拿破仑三世一样，拿破仑三世便背着法兰西国家议会几乎一夜之间把关税保护变成了自由贸易。这些特点多少能让人理解为何官方批评家，尤其是于勒·热美泰尔<sup>③</sup>很少感受到潜藏在波德莱尔散文中的理论能量。

马克思在描述职业密谋家时继续写道：“对他们来说，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很好地组织密谋策划活动……他们醉心于创新，醉心于能创造革命奇迹的东西；他们热衷于燃烧弹，热衷于具有魔力

---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梁赞诺夫（D. Rjazanov）编并由恩格斯作序的该书修订版，维也纳/柏林1927年版，第73页。——原注

② 波德莱尔：《作品集》，Yves-Gerard Le Dantec注释版，2卷本，巴黎1931/1932年版，第2卷，第415页。（此后只注卷数和页码）——原注

③ 于勒·热美泰尔（Jules Lemaitre, 1853—1914），法国戏剧批评家。——译注

的破坏性器械；他们热衷于暴动，而且这样的暴动越是想具有神奇惊人的效力，就越是要远离合理的依据。他们不断地搞这样的阴谋计划，眼里所见的目标只有一个：推翻现政府。他们极端轻视对工人进行关于阶级利益的理论启蒙，这说明他们对黑衣人士（穿黑色燕尾服的人），即多少受过教育人士的憎恶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纯粹平民的。这些人代表运动这一方面，并且又是党的正式代表，因而密谋家们始终不可能完全不依赖他们。”<sup>①</sup>波德莱尔的政治洞察力在基本上没有超越这些职业密谋家。无论对教士反动表示的同情，还是对 1848 年革命的同情，他的表态都是突如其来，因而其根基都是脆弱的。他在二月革命那些日子里的表现——在巴黎街角上挥舞步枪高喊“打倒奥匹克将军”<sup>\*</sup>——便很能说明问题。在任何情况下他应该都会接受福楼拜的名言：“在所有政治事件中，我只懂得一件事：反抗。”这里可以根据他一篇札记（这篇札记连同他比利时随笔一起流传了下来）的最后一段文字来理解：“我说‘革命万岁’宛如我说‘毁灭万岁，忏悔万岁，惩罚万岁，死亡万岁’。我会不仅乐于做个受难者，而且也愿意做个刽子手——以便从两方面去感受革命！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们所有人骨头里都有梅毒一样。我们都已经被染上了民主思想，就像我们都染上了梅毒病体一样。”<sup>②</sup>

人们可以将波德莱尔在此表达的想法称作煽动者的形而上学。他是在比利时写下了这段话，可是，他却一度被视为法国警

---

① 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评谢努“密谋家”》，巴黎 1850 年版，以及德·拉·琥德：《一八四八年二月共和国的诞生》，巴黎 1850 年版，转引自《新时代报》第 4 期（1886 年），第 556 页。——原注

\* 奥匹克将军系波德莱尔的继父。——原注

② 波德莱尔：《作品集》，第 2 卷，第 728 页。——原注（中译据钱春绮译本，下同）

方的暗探。其实，人们对如此看待波德莱尔并没有什么陌生。他在1854年12月20日曾就文人领取警方津贴一事给母亲写道：“我的名字永远不会出现在他们那可耻的账单上。”<sup>①</sup>波德莱尔在比利时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名声恐怕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对雨果显露出了敌意——雨果在当时法国被剥夺了公民权，但在比利时却受到热烈欢迎——他那具有杀伤力的冷嘲热讽也助长了这种谣言的出笼，而他本人恰恰又乐于传播它们。后来，大话崇拜（*culte de la blague*）又出现在乔治·索莱尔<sup>②</sup>那里，而到了法西斯主义那里则成了不可或缺的宣传手段，但其最初的运用则见于波德莱尔。瑟林<sup>③</sup>写作《屠杀琐闻》的题旨及书名本身就可以直接溯源到波德莱尔的一段日记：“可以精心策划一次密谋，以灭绝犹太人种。”<sup>④</sup>布朗基主义者黎镐（*Rigault*）是在巴黎公社警察局局长的位置上结束其密谋生涯的，他似乎也有那种波德莱尔式的使人毛骨悚然的诙谐，在描述波德莱尔气质时，人们经常提到他。普鲁勒（*Ch. Proles*）在其《一八七一年的革命者》一书中写道：“黎镐在处事上尽管冷酷无情，但依然带有一些粗狂的诙谐，这是非他莫属的，他的狂热同样如此。”<sup>⑤</sup>就连马克思在密谋者身上遇到过的恐怖主义白日梦也能在波德莱尔那里找到相应的东西。波德莱尔在1865年12月23日给母亲的信里写道：“一旦我重获那曾几度有过的朝气和精力，我将用惊世骇俗的书籍发泄我的怨愤，我要使整个人类起来同我作对。这将给我快乐，给我无限的安慰。”<sup>⑥</sup>这种积压

① 波德莱尔：《致母亲的信》，巴黎1932年版，第83页。——原注

② 乔治·索莱尔（*Georges Sorel*, 1847—1922），法国政论作家，对马克思主义和议会民主展开了尖锐批判。——译注

③ 瑟林（*Louise-Ferdinand Celine*, 1894—1961），法国作家。——译注

④ 波德莱尔：《作品集》，第2卷，第666页。——原注

⑤ 普鲁勒：《黎镐：巴黎公社时期的警察局局长》，见《保人》（《一八七一年的革命者》），巴黎1989年版，第9页。——原注

⑥ 波德莱尔：《致母亲的信》，巴黎1932年版，第278页。——原注

着的怨愤——法语中所说的暴怒（la rogne）——是半个世纪的街垒战在巴黎职业密谋者身上培育出的激情。

马克思曾就这些密谋者指出道：“正是他们筑起了第一批街垒并进行了指挥。”<sup>①</sup>其实，街垒才是密谋者的固定活动场所，街垒本身历来具有着革命意义。七月革命期间有四千多个街垒设置在城中。<sup>②</sup>当傅立叶要为出于热情而非出于报酬的工作寻找例子时，他发现没什么比筑街垒更能说明问题了。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对那些街垒系统的详尽描绘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他并没有注意那些掌管它们的人们。“暴动者有自己的警察，他们无影无踪，在各处秘密巡察，维持秩序，那就是夜深人静时的黑夜。……他们的双眼可以俯视那一片阴影，或许能在很多分散各处的地方看到一道模糊的亮光，凭借这道光亮可以辨别出那些破损不齐的轮廓，一些奇形怪状建筑物的外貌，在这些废墟中有一些类似光亮的东西在晃动，那便是街垒所在。”<sup>③</sup>波德莱尔曾想用《致巴黎》一诗来结束他的《恶之花》，在这首没有写完的诗篇中与巴黎告别时，他并没有忘记提及那些街垒，他提及了“那些筑起高高街垒的神奇石头”，<sup>④</sup>当然，那些石头是“神奇的”，因为波德莱尔的诗句只字未提那些搬动它们的手。可是，布朗基主义或许也有这种感伤，因为布朗基主义者特里东（Tridon）做出了类似的呼唤：“噢，暴力，街垒女神，你在火光和骚动上闪耀……囚犯们带着

---

① 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评谢努“密谋家”》，巴黎1850年版，以及德·拉·琥德：《一八四八年二月共和国的诞生》，巴黎1850年版，转引自《新时代报》第4期（1886年），第556页。——原注

② 参见格让尚铖（Ajasson de Grandsagne）与珀茹（Maurice Plaut）：《一八三〇年革命》（巴黎1830年版）一书中巴黎斗士们在7月27，28，29日的计划。——原注

③ 维克多·雨果：《作品全集》，原稿版，小说卷之八，《悲惨世界》，巴黎1881年版，第522—523页。——原注

④ 波德莱尔：《作品集》，第1卷，第229页。——原注



锁链的手向你伸去。”<sup>①</sup>在公社的最后几天里，无产者们像受了致命伤的野兽那样退回到了街垒里面，在后面摸索探路。受过街垒战训练的工人并不适应那露天战场，否则，梯也尔（Thiers）的退路将被挡住，这也是他们失败的原因所在。一位研究巴黎公社的史学家最近说：这些工人“更喜欢在自己的街区里打仗，而不是在野外同敌人打遭遇战……如果他们必须死的话，他们情愿死在巴黎那用鹅卵石筑起的街垒后面”。<sup>②</sup>

当时，巴黎公社最重要的街垒指挥布朗基（Blanqui）正被囚禁在他一生经历的最后牢狱陀茹（Taureau）要塞中。马克思从他和他的伙伴身上看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sup>③</sup>对于布朗基在世时及身后所享有的革命威望怎么说也不会过分。列宁之前，再没有哪个人在无产阶级中有如此鲜明的形象，这一点也在波德莱尔那里留下了印记，在他那些随意画出的素描中就有一幅是布朗基的头像。——马克思用以描绘当时巴黎密谋氛围所作的表述清楚地表明了布朗基的双重性：一方面，人们有充分理由将他视为一个暴动派。如此这般，他就代表了这样一类政治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类政治家将自己的任务看成是“抢在革命的展开过程前去行事，结果使革命人为地陷入困境，使革命成为了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冲动”；<sup>④</sup>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布朗基做出另一种

---

① 转引自贝努瓦斯特（Charles Benoist）：《现代国家的危机：“工人阶级”的“神话”》，载：《两世界》杂志，第84年号，第6期，第20卷，1914年3月1日巴黎，第105页。——原注

② 乔治·拉隆兹（Georges Laronze）：《一八七一年公社的故事》，据未出版的资料和回忆录整理而成，巴黎1928年版，第532页。——原注

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维也纳/柏林1927年版，第28页。——原注

④ 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评谢努“密谋家”》，巴黎1850年版，以及德·拉·琥德：《一八四八年二月共和国的诞生》，巴黎1850年版，转引自《新时代报》第4期（1886年），第556页。——原注